

资中筠自选集(全五卷)：坐观天下

作者：资中筠

坐观天下 文前部分

自序（1）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说来，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

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

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说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

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竖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

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自序（2）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

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

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

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

《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

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

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自序（3）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

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

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 GDP 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

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

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X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

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国格与人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

“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

关于我的履历

不知从何时起，我在公共场合被介绍身份时，主持人常提到“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有时还要加上“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起初我还不以为意，后来越来越感到不是滋味，于是有机会就要说明：我

年轻时在外事单位工作，由于专业学的是外文，主要工作之一是翻译，重头是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间或也为一些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见外宾做翻译，但只占工作的一小部分，临时应命，绝非专任。那时候国家领导人并没有专门的翻译，只是有关部门掌握一个相对固定的各种语种的翻译名单，以便随时需要，临时召唤。在1959年至“文革”之前一段时期，看来我被列入了这个名单，所以不时应召接受任务，平时就在本单位工作。如此而已。另外，既然做对外交流工作，接触的人中包括外国名人、要人，这也不足为奇。

最近做客“人民网”，关于我的介绍

中又突出这一点。“天涯网”的介绍干脆把这作为我唯一的身份。我更感到有必要郑重说明，以免被误以为曾经是“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前几年有一本颇有影响的畅销书，作者在特殊年代曾任毛主席的翻译兼英语教师，在特殊的政治风云中曾红极一时，书中的自述情节对不明就里的公众说来颇“吸引眼球”，可能给不熟悉当代历史的人们一个错觉，以为曾担任高层翻译，就必然关系密切，或地位特殊。因是之故，我更觉得有必要予以澄清，说明我不属于那一类人，也算是爱惜羽毛吧。在我所处的年月，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无论为谁翻译，只是一项普通的工作，最多说

明在业务水平上得到一定的认可，但也不一定是最高水平，因为外文水平更高的，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何况此类工作只不过“用其一技之长”，不会因此显赫起来。

另外还有一层，我年轻时被分配做了十几年翻译，并非初衷。那时“此身非我有”，工作不是自选的。后来越来越感到厌倦，对因工作关系而得以见“大场面”，接近“大人物”，兴趣索然。旁人看来也许以为值得羡慕，我却有庄子寓言中的“腐鼠”之感。所以改革开放之初刚可以有一点选择权，要求调工作不再算大逆不道，我就赶忙申请调到研究单位，以读、写为业。不论如何，总

算有一点独立性，从此告别整天重复别人的话之苦。（至于笔译我自己选择的、自己欣赏的古典名著，或有意思的美文，那是一种“再创作”和自娱，又当别论。）我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只有短短的五六年中有过为领导人翻译的经历，难道其他都不足道？特别是后半生虽然碌碌无大成就，但也多少有所思考，形诸文字，任人评说。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有无价值，以此为准，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抬高自己。所以，对此类介绍产生逆反心理。为什么外界偏偏注意这一点呢？也许是出于误解，以为说明一种地位，算是恭维；或是迎俗，大人物总是“吸引眼球”

的。我本可以不去理会，但是近来遇到此类介绍越来越多，这一身份越来越突出，使我感到非表明态度不可，以免人们以为是我自己喜欢以此炫耀。我不能否认，也无需讳言我曾有此工作经历。幸好，本人在“文革”开始后入了另册，与红墙之内绝缘，于是在我的翻译经历中没有“四人帮”成员以及当时任何一位新贵，这是值得庆幸的。在那个特殊年代，为“首长翻译”确实只限于极少数特殊人物了。但是假设（只是假设）我当时竟然也被召去执行为某人翻译的任务，当然是无法拒绝的，那么今天“曾为……翻译”该如何介绍呢？

所以，我今天对“独立”二字弥觉

珍贵，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也希望世人以此知我、罪我。

（近有各种版本关于我的简历介绍，常有错误和不确处。以下附上我认可的简历，事实以此为准，详略可自行摘取。）

资中筠简历

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1930 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1947 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 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 年毕业。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人民保

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因工作关系，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有机会访问亚、非、欧、拉美多国，并在维也纳常驻三年。“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尼克松访华前，从干校调回，参与接待工作，以后留在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70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后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研究员、所长。专业为国际政治与美国研究，旁涉中西历史文化，近年来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改革开放后多次访美，从事学术交流。

曾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及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任研究员各一学年。

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 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主要著作：《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 年修订

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

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等。

（以上在思想上较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纪的美国》、《财富的归宿》以及收入《斗室》和《读书人》的一些文章。）

译著：（法）巴尔扎克《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美）薇拉·凯瑟《啊，拓荒者》，（英）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等。

坐观天下 说不尽的大国兴衰

前言

最近中央电视台二套经济频道连续放映十二集系列片，题为“大国崛起”（以下简称“纪录片”），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因而一再重播，可谓“热播”。两年前，几位主创人员向陈乐民和我就这一创意征求意见。坦率地说，我们在对他们的雄心壮志表示钦佩的同时，不无保留和担心。首先对“崛起”一词有异议，更主要是担心是否会重复“船坚炮利”、“开疆拓土”的传统诠释思路，或者单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从而对当前把“崛

起”挂在嘴边的国人产生误导。如今这部片子终于问世。值得欣喜的是，总体而言，历史的主线在其中得到相对客观的、综合的表述，脉络清晰，对“软实力”的重要性也给予一定的关照，在我国媒体目前的处境下，已属难能可贵。有许多珍贵的镜头，精彩的表述，无法一一列举。遗憾和缺陷当然是有的，估计大半不是由于创作者的不知和不能，而是形格势禁，只能有所不为。

大国兴衰是一个说不完的题目。本文不是对这部纪录片的评论，而是借此由头抒发一些感想。人类从蛮荒进入文明——有文字记载不过几千年，而进入“现代化”的历程就是这些大国相继兴

起的五百年。这几个国家各领风骚或长或短，其所以有资格作为“大国”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不在于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事实上所谓“大国”，不少是小国），而在其有所创新，成就大事业，对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每个国家兴起的过程各有自己的特色，但也有共性，要之，都不是事先设计好，而是顺应发展需要自然形成的。

一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

以荷兰为例：荷兰应算蕞尔小国，而且地势低于海拔，得天并不算厚，其

有利条件就是有海港，所以只能以贸易求生存。它的始发优势在于自由、平等、开放，特别是务实精神，最少虚荣的包袱。它是当时欧洲思想最自由、对各种宗教信仰最宽容的国家，因而吸引了各方人才。它从实际出发，顺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不经意中创造高度发达的商业文化，有诸多对后世发生深远影响的创新。例如别出心裁地发起全民集资办企业，是为股份制之滥觞；为代替分红发行证券，出现证券交易所，早于纽约一百年；又因势利导建立信贷业，为银行的雏形，早于英国一百年；它先有村民和社区自治，后有统一的王国，因而有最成熟的市民社会，最少森严的等级。

证据之一是，作为其艺术特长的油画，不画神、不画王公贵族，而多画平民百姓日常生活。这一点即使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也属少见。我们看到那个时期的欧洲油画多半是拟人化的神，或是宫廷贵族肖像，而荷兰画以自然风景见长，人物则健壮的农人、农妇、胖乎乎的厨娘都是主角。当然作为航海国家，造船业也有独到之处，其独特的造型也是从实际需要出发——为了多装快跑。总之，荷兰之强盛，似乎是无心插柳，水到渠成。并非是先有一位雄心勃勃的君主，做出英明的规划和决策，然后成其霸业。

英国的历史就更加丰富。人皆知其曾为“日不落帝国”，实际上这一巅峰期

只存在了不到一百年，而奠定现代英国的基础的《大宪章》，远在 13 世纪就已制定，贯穿其中的原则精神引领英国八百年，直到今天。毋庸赘言，它同时也是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那位跨越 16—17 世纪，领导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而奠定英帝国霸业基础的伊丽莎白一世，正是由于恪守《大宪章》“王在议会中”、“王在法下”的原则，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和威望，使英国得以在稳定、宽松的环境中繁荣昌盛。再传至查理一世，也正是由于反其道而行，企图越过宪章，扩大君权，实行专制，结果招来动荡和革命，把自己送上断头台。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以暴易暴，掌权后更加独

裁，结果也被推翻。直到“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又回到《大宪章》的轨道，确立了几百年国内的长治久安。这段历史说明君权民授和法治精神已深入英国人心，形式上有一个国王，实质上绝不能容忍任何专制。于是在这片国土上适时地产生了培根、洛克、牛顿、瓦特、亚当·斯密、凯恩斯……一连串光照世界文明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

17 世纪以来，法国和德国思想家辈出，宗教革命、启蒙、理性、逻辑学、辩证法，法国大革命，响彻世界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人权宣言》……这些耀眼的珍珠缀成的链条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闪光。作为国家的盛衰，法国

和德国各有其曲折道路。路易十四的法国与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差不多同时臻于鼎盛，但是绝对的君主专制，没有留下一种类似《大宪章》那样限制君权的机制，还需要一场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几经反复，才确立法兰西共和制度，以《拿破仑法典》为保证。不过法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辉煌成就从路易十四时期就已达到高峰。法语在历史上的持久影响力无与伦比，几百年中，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都以法语流利为文化修养的标志，直到上个世纪 50 年代，法语一直是国际活动主要语言，以后才逐渐为英语（美语）所代替。纪录片最后一集给巴黎“先贤祠”以特写镜头，是画龙点睛

之笔。“先贤祠”的正门上铭刻着：“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 72 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 11 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形象地表现了法国以文化傲世的特点。

德国作为后来者，纪录片点出它的教育兴国，是抓住了核心。德国的高等教育有诸多创新，曾为世界的榜样，对美国 20 世纪初的教育改革都有影响。而其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造就了素质极高的国民。除了众所周知的知识精英在哲学思想、文学音乐方面的贡献外，普通公民的敬业自律、劳动者的技术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也为世界之首，因此

“德国制造”本身曾一度成为工业品的世界品牌。

事实上欧洲文明国家不论大小，都有尊重思想文化的特点，代表国家骄傲的多是文化人而不是王公大臣：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丹麦的安徒生、挪威的易卜生、格里格……更不用说意大利、奥地利的人文荟萃了。纪录片最后一集有一段旁白可圈可点：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也许这是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愿望，但是人们可以在无尽的岁月中无限地接近它。英国首相丘吉尔

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近代欧洲发轫于13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以但丁的《神曲》为标志，之后一段时期群星灿烂。这套纪录片没有给意大利一席之地是不小的缺失。从文明史的角度，如果有一集把欧洲作为整体而不是国别来叙述，应该从意大利开始，可能弥此不足。

二 社会福利的创新

这一历史时期“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兴起和成熟的过程。

《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兴起中的

革命作用和资本的威力有非常精彩的描述。资本主义以空前的效率促进科技进步，创建丰裕社会，同时必然造成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宣言》指出，这种社会矛盾终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而且马克思还曾预言这一革命将在英国发生。但是历史没有实现这一预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欧美国家都及时进行了改良，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现在的新名词叫“社会创新”。

英国是社会创新的先驱，早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1601 年颁布了统称《伊丽莎白法规》的济贫法，是为政府用法律调剂贫富之始（事实上英国第一部《济贫法》出台是在 1388 年，不过范围甚小，

此处暂不论)。到工业革命之后，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特别表现在城市条件恶化，英国最严重，同时又是城市改革的先驱。1845年恩格斯发表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示伦敦工人的恶劣生活条件，到1892年恩格斯为此书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就承认：从那时以来，城市触目惊心的恶劣条件已得到改善，原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这一变化发生的半个世纪正是英国处于“日不落帝国”的全盛时期。在恩格斯的名著首发近百年后，就在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1942—1943年间，英国又出现了全面社会保障的“贝弗利奇计划”。这一计划尚未经国会通过

就在国内发行 50 万份，大受欢迎，宣传部门印成小册子发给前线士兵，以鼓舞士气，让他们知道是在为怎样的生活而战。战争结束后，各政党都以这一计划为竞选的号召。1945 年工党当选执政，第一批措施就是根据这一计划，通过一系列有关法律，付诸实施，延续至今。也就是说，英国不论在帝国盛时，还是在危急存亡之秋，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条件的努力一直延续不断。

其他国家或先或后都建立了缓和矛盾、照顾弱势群体的各种制度，并根据各国国情百花齐放，逐步完善。事实上，人民福利也是各大国互相竞争的一个领域。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以国家为主导

的各项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法国强调民间互济，政府为辅。英国在半个世纪的改善福利过程中，一直以德国为竞争对象。美国发现自己在“人道主义”方面落后于欧洲，以德、英为榜样急起直追，到罗斯福“新政”时确立了美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才停止向欧洲学习。如果从中找出共性来，那就是，“大国”之为“大国”，其国民的基本权利和生存条件也须得到保障，并一般优于同时期的他国。当然，这种社会创新并非都出自统治集团的自觉，劳动者有组织的斗争、大众媒体的批判和监督、各种改良和革命理论——费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形成推动改革的综合力量。思想界的百花齐放从人文、哲学走向更实际的社会科学也是时代的需要。没有这方面的改革，没有全民的最低福利保障，作为现代化的“大国”是难以为继的。

至于高水平的福利又带来新问题，也难以为继，这是另一课题，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三 何必讳言民主自由？

见到本片的主创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中竭力表白主要不是民主的问题。

《南方周末》的采访稿特意把“主要不

是民主”作为小标题。这令我有点滑稽感。民主何罪，民主何害？为什么要这样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些国家强盛之路难道与民主无关，还是专制独裁的产物？诚然，民主绝非充足条件，不是灵丹妙药，但是从英国《大宪章》到光荣革命到美国制宪会议到法国大革命，难道不是确立民主的过程？欧洲从中世纪走向现代，是从神权走向人权，从专制走向民主（君主立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等级特权走向平等法治的历史。这一切不仅是少数精英的觉悟，而且成为全体公民的共识，也就是全民从蒙昧走向启蒙的过程。这是一段渐进的、漫长的历史，同时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宝贵贡献。

各国的发展道路千差万别，民族特色十分鲜明，但又有其不可逾越的普遍规律，以及作为现代人的普适价值。当然不是只要有了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就万事大吉。德国希特勒被选上台常被那些贬抑民主选举制者作为反面例证。诚然，希特勒是通过选举执政的，但是一旦上台，他和他的纳粹党就把法治民主撇在一边，奉行极端的集权独裁，以残酷手段压制各种理性的呼声，煽动极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之作为灾难的象征，难道不是对内残酷的集权专制？德意志民族的悲剧总不能算在民主头上吧？本片中有一个镜头重复两次，即著名的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奥斯威辛犹太人

墓前历史性的一跪，旁白是：“勃兰特总理跪下去，德意志民族站起来。”一个能够这样彻底反省的民族，正说明它还有从宗教革命以来与欧洲文明发展轨迹相吻合的传统，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信，因而也是有前途的。

再以俄罗斯彼得一世为例，这是在俄罗斯历史上彪炳千秋的大帝。他目光如炬，为了俄罗斯的现代化，义无反顾地向西欧学习，不惜微服游学，亲自以学徒身份从工匠做起，这样的胸襟和虚怀可谓亘古一人，对俄罗斯的强盛功不可没。但是他唯独没有学来的是宪政、法治和民主的精髓。他求胜心切，企图借助绝对君权，用专制高压手段，以一

己之力把俄罗斯强行推入现代社会，既不设法从其他王公大臣中取得部分支持，也没有触动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他的先进思想并没有成为俄国人的共识。表面上似乎效率很高，结果欲速则不达，连自己的儿子都未能说服。在其身后，许多措施人亡政息，俄罗斯又走了一大段弯路。从沙俄到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版图几经变化，仍不失为横跨欧亚大陆的真正“大国”。但是其现代化的道路崎岖多难，少渐变而多突变。彼得大帝未能着手改变的专制基因，成为俄国前进道路上沉重的包袱，历经多次历史变革，乃至天翻地覆的暴力革命，仍难触动。

窃以为，纪录片以荷兰和英国三集

最为精彩，其他各集也各有所长。相对而言，俄罗斯下集有关苏联部分有诸多败笔，甚至具有误导性。首先把美国罗斯福“新政”与苏联计划经济相提并论，大谬而不然，二者本质上不同，这里不再赘言。片中提到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人们向往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一个极短时期内确有此现象。但是紧接着就是斯大林的“大清洗”，使以自由平等为理想的进步人士希望幻灭。对此，我国通常的称谓是“肃反扩大化”，那是委婉语。实际上绝不是“扩大”问题，而是方向问题、制度的本质问题。所“肃”者极少是真“反革命”，而是革命元老、知识精英、民族精

华，而且此后高压和清洗成为经常性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断地摧残民族元气。诚然，最后战胜了法西斯侵略，是苏联人民的光荣业绩，这是以千百万红军的英勇牺牲和百姓的苦难为代价的。如果当初苏共大批精英以及包括图哈切夫元帅在内的大批优秀将领都未遭清洗，如果至少领导层还有正常议事的民主生活，苏联人民是否一定会遭此浩劫，反侵略战争开始时是否会那么被动，牺牲是否必须那么惨重？这段极具警世意义的历史在纪录片中完全不见。除了这一重要的缺失外，还给人这样印象：似乎严密的计划经济、以残酷手段镇压和剥夺农民、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重工业，

都是不得已的，要大炮只能不要黄油，甚至这些都是后来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条件。当然“误导”不会是编者的主观意图，只是重点的取舍，客观上就会造成某种印象。

我不知道，是否点出了斯大林的“大清洗”，片子就会遭到“枪毙”。作为旁观者，不体会其中甘苦，可能落“站着说话不腰疼”之讥。其实我能够理解主创者的苦衷，从一开始就兢兢然、惴惴然，唯恐通不过审查，一再“自律”。例如关于英国的两集中有关洛克的内容、美国独立的口号“没有代表就不纳税”、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十项权利法案的产生过程……诸如此类精彩片断都割爱

了。为了争取播出，其情可悯，其境可叹，不应加以苛求。

四 “兴”与“衰” 的标准

这些大国都有殖民扩张的历史，以种种巧取豪夺占有他国财富充实自己的国库。它们在国际上奉行强权政治，善待本国人，却虐待他国人，其依据是“种族优劣论”。所以一方面在国内高举自由、平等、人权大旗，一方面可以心安理得地剥夺他国人的权利。不仅统治者如此，许多真诚信奉人道主义的进步人士也认为“劣等民族”（或种族）不配享受“文明”国人所享受的权利。到纳粹德国对

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政策，种族主义达到登峰造极，却也因此随着纳粹主义的灭亡而臭名昭著。二战结束后，种族平等、民族平等的观念确立为国际准则，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潮流势不可挡，到 20 世纪 60 年代殖民地纷纷独立。从此，不论个人潜意识还有多少残余，公开宣扬种族主义在文明世界已无法立足。今日的世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是在新的平台上以另一种游戏规则进行。

大国消长如月之盈亏，是人间正道。从这些大国的历史来看，以竭尽本国人力、物力，剥夺本国人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穷兵黩武进行侵略扩张，尽管“船

坚炮利”，只可得逞于一时，最终必一败涂地；而凡能继续立足的，本国人在国内基本上得到善待是必要条件。如荷兰和英国，迫于历史潮流，退出殖民地，版图大大缩水。从“霸业”角度看是“衰落”，但降为“二等”国，退居本土，照样繁荣发达，仍不失为乐土。现在欧洲国家创立了“欧盟”这样一种国家关系的新形式，是否能够成功，又成为一种推动历史的制度创新，还言之过早，但至少是历史发展到某种阶段的新尝试。美国现在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正自以为“替天行道”，牛气冲天。能否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收缩，退居正常国家，尚待今后美国人的智慧。总之，从

以人为本出发，以广大人民的福祉为标尺，“大国”排行榜的名次只能表现暂时的兴衰。例如北欧诸小国，廉政、福利都居世界前茅，小小芬兰教育高度发达，且国家全包，这不也是一种排行法？

五 是兴奋剂还是清醒剂？

此片一出，在国内外都引起某种躁动，普遍认为，这是中国为自己“崛起”为下一个“大国”做准备。《纽约时报》有一篇专稿，题为“腼腆的巨人不再故作谦虚”有一定的代表性。文章说现在中国不再否认企图很快成为这样的“大国”了，要放弃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

晦”的策略了——“韬光养晦”的英译文再翻回中文就是“藏起野心，掩饰利爪”（！）。通篇文章内容无甚新意，无非是列举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一些举措，暗示或明示“中国威胁论”。外人愿意如何评论，是他们的事；国人的心态和反应才是重要的。我没有做过调查，无法做出科学的评估。只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隐约感到在某些人中有一股虚骄之气，与国外不论出于何种动机的夸大偏颇之论相呼应，似乎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中心的大国已经在望。在这种背景下，当前这部片子可能起两种作用，一是作为兴奋剂加强了这种躁动的心态；一是作为清醒剂，启发国人深思文明发

展的规律，从而客观地认识到我国前面的道路崎岖而修远。我希望是后者。

我更希望的是，本片的观众先别忙着联系自己。多年前，在本人主持《美国研究》时就曾一再强调，以客观、全面、深入弄清楚美国为宗旨，切莫轻言与中国“比较研究”，因为这种比较只能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而且一联系自己，就容易主观，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研究对象的国情进行取舍。例如前面提到有些关键内容因怕触犯我国当前“敏感”话题而回避。其实自己想不想要是一回事，不能因此不承认人家有此传家宝。且慢联系自己，不是永远不要反思，而是避免急功近利。中国人需要了解外国，

特别是世界发展的历史，过去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这点再强调也不为过。尽管有关世界历史的书籍，包括国别史，林林总总，但是耐心仔细阅读者日少。通用的教科书往往观点陈旧，取材偏颇，而且常有不少误导，亟待改进。这部纪录片，借助大众视觉传媒来表现15世纪以来先后在世界上称雄的九个国家兴盛的历史。跨越五百年，覆盖两半球，可谓波澜壮阔，的是壮举，也是创举。本文前面虽有一些求全之责，总体上还是认为值得大力肯定。它提供了新的视角，至少比传统的教科书有许多突破，单是普及知识就起到书籍所不能起的作用。如果进而启发出一批历史

爱好者，以此为契机，就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作进一步学习探讨，那就功劳更大。再要强加于它过于沉重、似是而非的使命，就是多余的了。

（2007年1月）

坐观天下 百年风云启示录

《冷眼向洋》书系总绪论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人们纷纷回顾这百年来的曲折里程。犹如从加长的万花筒旋转镜头中观看五彩缤纷的世界。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纪动画，企图作一番深入的反思，从中找出规律性的启示来，洵非易事。本书系想探讨的问题

有两个，一是美国何以兴，苏联何以衰？另一个问题是明显加快步伐的全球化大趋势及其种种悖论，特别是当前民族矛盾突显的现实，应该怎样理解？再进一步说：为什么 20 世纪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所预言的那样走向腐朽、灭亡，反而又有了新的发展，继续显示其生命力？为什么曾经令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雀跃欢呼、无限向往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曾经是一时之雄的超级大国，竟在 70 年后忽然解体，幡然易帜，作为一种制度在这一大片欧亚大陆上受到严重挫败？

“全球化”这个词可能不见于马恩经典著作，但是“工人无祖国”、“全世界无

产者团结起来”、“自由人的联合体”等命题已经包含这层意思。今天，我们却看到各国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传统意义的各国无产者没有团结起来的迹象，而资产者却以各种形式联合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经常萦绕于几乎所有稍微关心世界形势的人的心中，谜面很简单，谜底却极为复杂，而且仍然存在多个探讨的角度。实际上这两大问题既是不同的问题，在深层次又有内在联系。我们尽量透过科技、经济、政策、制度等外层的硬壳深入到问题的软核心来探讨，大体上形成了本书的思路：

一 对发展与平等

的追求

综观 20 世纪的社会变迁，归根到底有两大动力，一是求发展，一是求平等。前者导致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突飞猛进，后者导致改良和革命。当然社会发展的进程从几千年前就已开始，但是那种激烈竞争、不进则退、速度就是生命、扩张为本能的发展方式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有精辟的阐述。这种方式当然不始于 20 世纪，却是在 20 世纪达到最大的覆盖面，把所有独立的国家都卷入其中。至于平等的要求，则并非“自古以来”就有的。人总是向往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各个时代、各个阶层

的人心目中幸福的标准不同。在旧王朝制度下，以血缘为基础把人分为等级因而权利也按等级分配，被视为天经地义，平等并不列入基本的幸福观。直到 18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亦即每个人都生而具有一些相同的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这才把追求平等提到日程上，并且成为革命的动力。到了 20 世纪，这种思想向东传播，导致中国和俄国两个大国最后王朝的崩溃。此后在主要的文明大国中，不论还有多少王权和贵族制度的残余，“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反对各种不平等的表现成为正当的权利。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就一个社会内部而言，“发展和平

等”成为 20 世纪的两大追求。但是这二者又充满了悖论。在科学技术、物质生产以空前的加速度前进的同时，社会矛盾也空前尖锐化。各种企图解决矛盾的学说和模式仍然不外乎在这两大追求之间寻求侧重点。无数思想家、政治家和实践者提出各种理论和方案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即使成功也是相对的，新的矛盾又在新的水平上出现，如此往复，人类文明得以进步。就一个国家、一种社会而言，所谓成功与失败主要不在于政权在谁手中，或是疆土的扩大和缩小，也不是单纯的增长数字，而是要看相对来说哪个能更好地满足人类的这两大诉求，同时较好地解决或至少缓解二者的

矛盾，取得相对平衡的进展，从而达到真正的兴旺发达，否则反是。事实上，对 20 世纪的发展起重大作用的思潮在 19 世纪中期已经形成，不过在 20 世纪得到最大规模的实施。可以说，整个 20 世纪给各种思潮提供了登台表演的历史大舞台。

二 自由与平等的 相悖与相成

毋庸赘言，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使人得到全面解放，释放出来空前的创造力。接下来欧洲独领风骚几百年，令人惊叹的科学发明层出不穷，艺术文化绚丽多彩，同时思想家辈出，

各种主义、学说纷纷登场，百家争鸣，形成灿烂辉煌的思想史，物质和精神文明都达到前人无法想象的高度。总括起来，在实际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广义的自由主义。其基本出发点是：通过个人的才智和力量在创造财富中得到充分发挥以达到全社会进步，这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也是其结果。它的理想的程序是：先从各个不同的个人和群体所追求的特殊目标和价值出发，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创造，然后转化为人类普遍的进步和繁荣。问题是，在现实中并非全社会所有人群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同步共同富裕。自由市场的本性是追求最大的利润，其中

必然包括激烈的竞争和淘汰，每一个人为达目的，都不惜牺牲他人，不断制造“受苦受难”的人群，于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平等正好成反比的现象，受益者和受害者日益壁垒分明，对后者说来，日益不堪忍受。于是而有各种从受害者出发的学说和解决方案。从费边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各显身手。这些主张都关心弱势群体，而手段不同。总的说来，一种是在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改良，一种是彻底推翻旧制度重建新的发展模式的革命。在实践中改良还是革命，往往不是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取决于客观形势，实际上取决于统治者有没有足

够的意愿进行适时的、顺应发展需要的改良，也取决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习惯的行为模式。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过无数次民众起来推翻现政权的暴力革命，绝大多数都符合列宁的名言：

“统治者不能按旧的方式统治下去，人民不能再按旧的方式生活下去。”换言之，也就是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本书的主题不是讨论革命和改良的历史条件，而是试图总结 20 世纪的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两大发展模式的实践经验。

这里首先要将一些概念交代清楚：有些论者往往把自由与平等对立起来，似乎自由主义是不要平等的。这是误解，是把经济上的“放任主义”

(laissez-faire)与整个自由主义等同起来，或者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代替了自由主义的全部。另外，美国自福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之后，出现了新的语义上的变化，“自由主义”成为关注平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加强福利政策这一派的思潮，或称为“新自由主义”；而“保守主义”则是指强调自由竞争、偏于放任主义，在政策上向投资者倾斜这一派。这是美国政治特色的产物，不能就此成为“自由主义”完整的定义。本书提到的“自由主义”如果不加说明，主要指从16世纪的英伦肇始，经过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充实、丰富起来的经典意义上的理性自由主义，它包括自由和平等两

个方面，因为人生而平等本来是自由主义最基本的信仰。

洛克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其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就是：“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早期美国的思想先驱们也是自由与平等不分家的。杰斐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说得明白：“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

成立政府。”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平等现象日益尖锐，于是出现了不同的支派，其中一派影响较大的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本上不承认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经济压迫，认为既然大家都在同样的规则中竞争，那么失败者主要是自己无能。他们要争取的是取消种种导致不公平竞争的外部条件，包括政治特权、对四大自由的限制等。但是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兴起的同时，在自由主义者内部已经有各种改良的主张和理论，其关注点都是社会弱势群体，致力于缓解不平等现象，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能说这些人就不是自由主义者，

因为他们都信奉基本的天赋人权。社会主义则与自由主义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前者先集体后个人，后者反是。不过社会民主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并存，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专政学说与二者不相容，但是其关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的创造力，以及最终目的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些思想却是继承和发扬了欧洲的古典理论。

三 各种理论在欧洲与美国的实验

以上这些学说都兴起于或完善于 19 世纪中期，但是在 20 世纪得到最大规模的实践或实验。欧洲仍是首当其冲的花

色品种最全的实验场：除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根深叶茂外，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马克思主义在欧亚大陆加东欧、乃至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占领过舞台，对千百万人的命运产生过影响。其中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是纯粹的灾难，并已彻底失败。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并存，基本上站住了脚，至今仍在不断适应、磨合、改革中。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实践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受到了挫败，但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失去了生命力，它仍是世界公认的经典学派，并且是不断地研究、诠释和发展的对象。

20 世纪最大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实验场是美国。从精神资源而言，

美国的一切都来自欧洲，是欧洲文明的继承者，又是其变种。在源于欧洲的种种学说中，经过美国土壤的选择，得以生根开花的是自由主义。由于先天没有封建制度的历史包袱，自由市场经济在这里得到最无制约的充分发展。南北战争之后，亦即从19世纪最后的30年起，美国可以说是张开翅膀高速向前飞。在这过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财富高度集中。此时刚好斯宾塞的理论传到美国，为美国当时的实践找到理论根据，立即受到热烈欢迎。社会达尔文主义诞生于欧洲，但是在那里生不逢时，因为当时的欧洲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差不多同时兴起

的社会主义思想对它更为适合。这样，自由主义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支派始终成为美国的主流思潮之一，也是其社会发展的主要经线。但是如果只有这一条线，发展下去必然使美国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大丛林，使矛盾激化到无法缓解的地步，难免引起社会动乱乃至革命。美国自南北战争以后，历经经济和社会危机而得以平稳发展，是因为还存在另一条线——改良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倾向平等、主张政府调节经济、实行福利政策的思潮。整个20世纪，美国一直不断在进行渐进的改良，这是美国一大特色，也是一大强项。在这过程中，政策在上述两端之间摆动、

微调，而大的趋势是二者都向中间靠拢。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网，同时自由市场经济仍然高度发达。如果说，欧洲的福利制度更多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话，美国则主要是“新自由主义”。也可以说，欧洲自由与平等并重，而美国始终是先自由后平等。如果以“左”“右”来划分，则美国的社会思潮重心比欧洲更靠右些。

20 世纪西欧主要国家和美国都没有发生革命，只有群众运动和政府改良，也正因为有了及时的改良才避免了革命，这是其共同点（这是指一国内部，至于欧洲的两次大战和国家间的冲突，以及殖民地的独立斗争则是另一范畴的问

题)。并非是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天生比较明智，而要归功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批判的动力是知识阶层的责任感，其保障是充分的言论自由。因此，“不平则鸣”得到充分的发挥，任何社会不公和黑暗现象都得到不断的揭露和批判，形成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即使是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互相揭短、攻击，客观上也起监督和制衡作用。由于政府领导是民选的，他们既不能压制舆论，又不能置之不理，这就促成了改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反过来，这种改良和妥协也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所以既得利益阶层也有进行这种改良的动力。在这方面，得天独厚而

又远离战场的美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收到最好的效果。又由于它始终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线，较之欧洲尾大不掉的高福利制度，政府负担不那么沉重，平等与效率的矛盾也不那么突出。当然在美国，这些问题也是存在的，令历届政府头痛。于是在世纪末，英国布莱尔和美国克林顿同时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之说。这一提法不出自保守派而刚好出自工党和民主党之口，究其实质是从原来的立场向右靠拢，而不是相反。从目前来看，这在思路未始不是一种新的探索，但在实践中仍然属于微调，是否能成为渐变的改良的一个新阶段，尚未可知。

关于平等，也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机会均等，也就是在起跑线上平等；一种是结果平等，也就是缩小贫富差距。自由主义宣扬的是机会平等，但是初始机会的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欧洲资本主义是脱胎于封建社会，许多贵族转变为资本家，并非同属赤贫的人在完全同等的机会下竞赛。相对来说，美国在开发初期机会比较平等，第一代来自欧洲的移民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在广阔天地各显神通。但是到美利坚合众国建国时有产者和无产者之分已经很明显，尽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先来者有权制定对自己有利的立法要后来者遵守。发展到 20 世纪，片面强调起跑线上

的平等的虚伪性日益明显，而结果的不平等日益尖锐。单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对解决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都不是灵丹妙药。正因为如此，才有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乃至马克思主义出现，其理想都是通过某种制度达到一个公平的社会，使人人都享有幸福。

四 沙俄？苏联？俄

罗斯（1）

毋庸赘言，一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良，无论是机会还是结果的平等都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一点早已为实践所证实，马克思主义又在理论上作了最完整的论述，不但提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

本主义是科学的必然规律的论断，而且进而提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取消了私有财产的制度，才能消灭阶级，消灭人剥削人，从而达到真正平等、民主的理想社会。马克思设想这一革命应该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最发达最成熟的欧洲国家，如英国。但是历史的实践，是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的暴力革命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横跨欧亚大陆的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幅员辽阔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

优秀民族，19 世纪的俄罗斯人才辈出，其文化与西欧相比有其独特的风韵。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思想极为活跃，也是百家争鸣，学说蜂起，并且贡献出了“intelligentsia”这样一个有特定含义的词来概括有独立思想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但是与幸运的美国人不同，俄罗斯民族是在苦难中成长的，底层是农奴制，顶上是专制的沙皇统治，不存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俄罗斯分册”的作者冯绍雷以“东西方文明结合部”来概括俄罗斯的特点，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既然实行渐进的改良还是暴力革命，取决于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的习惯两个方面，那么，俄罗斯在这两个方面改良的

条件都不具备，暴力革命终究有其必然性。凡是通过暴力革命确立的政权，开头必然要有镇压反抗力量的过程。何况，十月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剥夺一切资产者的革命，其理论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更何况，当时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极度恐慌，联合进行武装干涉，声称要将其扼杀在摇篮里。由于列宁逝世较早，论者惯于把苏联的专制镇压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排除异己的党内清洗都归罪于斯大林的偏执狂。斯氏个人的因素固然有很大作用，但是理论的、制度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是斯大林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什么人成为最

高领导，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全党全民都能接受他或帮助他的高压统治。

考察苏联 70 年的业绩，最大的成就是实现了相当高度的工业化、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普及教育。这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对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巨大贡献，并在战后成为能与美国抗衡一时的超级大国的基础。但是，取得这些成就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从长远看难以为继。在很多重要方面，都与原来理论上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驰。

首先看平等，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对劳动者最有吸引力之处，也是在理论上彻底革命优越于形形色色的改良之处。但是，众所周知，在苏联最初物资匮乏

的几年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之后，就逐步形成实际上的特权阶层，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为突出。这种特权渗透于政治权利、职业选择、经济生活，乃至日常消费品的享有等各个方面。既无机会平等，也就谈不到竞赛规则的平等，因而不能刺激人的生产积极性。西方社会的贫富不均状况尚留有一条个人通过奋斗向上爬的道路，在这过程中同时有所创新，为提高社会生产率做出贡献。而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个人改善境遇之道在于在政治上绝对服从的前提下，在官僚化的各个社会领域中沿着阶梯向上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却较少与创造性的劳动相关，

甚至相反。对广大的底层劳动者而言，难以有爬入上层的机会。结果，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了广大的劳动者和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的上层官僚新的畸形的金字塔。

四 沙俄？苏联？俄罗斯（2）

再看生产力的发展，革命的基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从根本上讲是难以持续的，其浪费和无效，弊病百出，已为大家耳熟能详，不必赘述。更重要的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解放和创造力的发挥。俄罗斯的劳动者素质并不低：俄罗斯到20世纪初已经有高度发达的文

化，拥有大批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直到今天，原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普遍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在发达国家中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和分配制度无法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高压下的思想禁锢磨损了知识精英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很难想象大批有思想有头脑有学识的精英长期处于动辄得咎，被迫说假话，连生命的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一个民族能够兴旺发达。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情况在苏联或者没有实现，或者发生了异化。原设想，工人革命第一步使无产阶

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个无产阶级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在苏联的实践中，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做到了；但是上面标识着重号的内容却没有出现，实际上生产工具掌握在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一切的特权阶层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沦为机器的奴

隶的工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原来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后将享有更加高度的民主，但是相当长时间内对民主的理解与欲求要么化为无政府主义的“民众崇拜”，要么形成高度集权下的“愚民暴政”。苏联当政者口中“民主”一词用得不比西方少，却更加虚伪。平等既没有实现，“自由”更成为禁区。结果，“自由”、“民主”的专利权送给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与《共产党宣言》理想中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更是背道而驰。可以说，无产阶级革命被异化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方面，对马

克思主义的威力和苏联式革命的恐惧推动了美国和西欧各国的改良；另一方面，对于西方国家中不满足于改良，向往更为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士来说，苏联实际榜样的出现反而使理想破灭，使他们两害相权取其轻，转而与现制度中的改良妥协。对于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若干解释，都言之成理。本人又加上两说：一是“反面榜样”说，即上述苏联实践的负面效应；二是“时间差”说，即欧洲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到难以为继，为社会主义思潮提供土壤时，美国的发展正方兴未艾，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土壤。等美国感受到危机时，渐变的改良已经

开动，为“新自由主义”打下基础。美国的强盛又挽救和支持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

五 东西方的较量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自一诞生起，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仇视和包围之中，这种情况造成了国民的凝聚力，和对国内各种物质的与精神的艰苦条件的耐受力，成为一种刺激团结奋斗的力量；同时又使统治者有不实行民主、进行高压的借口。斯大林时期被清洗、遭迫害的对象，大多数的罪名中都有“帝国主义间谍”，就很说明问题。二战后的“冷战”促使苏联进行昂贵的军

备竞赛，导致国民经济畸形发展，消费品长期紧缺，牺牲人民的生活质量。这种情况又形成悖论：军备竞赛使国家经济不堪其负担，而维持国内的凝聚力又需要外部的紧张局势。事实上，苏联的制度是经不起缓和、松动，经不起“和平竞赛”的。一旦与西方正常来往，不再处于敌对的状态，人民就有所比较，就失去必须忍受原来的条件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赫鲁晓夫的“解冻”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都对苏联的解体起了催化作用，也不无道理。而这正说明苏联的凝聚力实际上已经相当脆弱。

在我国，认为苏联解体是西方“和平演变”的成功之说颇为盛行，由此推

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有限的开放就都是开门揖盗，是罪魁祸首。那么反过来，在外部世界突飞猛进、进入信息时代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联邦，照旧经济上国家垄断，政治上全面专政，对内实行思想禁锢和信息封锁，对外保持紧张关系，抵制思想文化渗入，加紧控制东欧各国，严守柏林墙，能长期继续下去吗？更重要的是能给苏联及其势力范围内的各国人民带来繁荣昌盛、幸福生活吗？诚然，在冷战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促变”是既定方针，是美国向全世界推行民主制度的大战略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其对外政策的“终

极关怀”。这是公开宣布的“阳谋”，同时也不排除使用阴谋手段，不过主要是阳谋。所以在东西方谈判中，西方力争的是文化交流和信息相通的自由，苏联方面力拒的也是这一点。1975年赫尔辛基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达成的最后文件是妥协的产物：苏联得到的是西方终于承认欧洲各国的边界“不可侵犯性”，特别是承认奥得—尼斯河为德波边界线；而西方得到的是苏联同意把“尊重人权”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人员自由来往的条款写入文件。前者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苏联占领的领土问题，实际等于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利害关系很好理解；而文

化、人员交流本是平等的互相的，为什么西方力争而苏联力拒呢？为什么苏联同意了就是给了西方便宜呢？因为苏联正确地看出西方意图以思想文化渗透促“和平演变”。那么，再进一步，既然是相互交流，为什么苏联不能对西方进行“演变”呢？不应忘记，共产主义从理论上就公开宣布以推翻一切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在实践中，十月革命后各国纷纷成立共产党，都听命于“共产国际”，也就是听命于苏共中央。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号下，各国共产党的忠诚首先是对“国际”，其次才是对本国。因此，西方国家的统治者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继丘吉尔喊出要把第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之后，美国掀起过两次反共高潮，一是 20 年代的“恐赤潮”，二是 50 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都是以“共产主义威胁”的名义矛头指向本国一部分人。说明当时西方统治阶级缺乏自信，感到一种威胁。但是后来在思想上攻守之势易位，害怕“演变”的就不是西方了。为什么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顶住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却在发展成掌握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之后害怕在对等基础上的和平的思想交流？事实上，在冷战期间苏联“文攻武卫”齐上，阳谋阴谋并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争夺势力范围，特别是新兴的亚非拉国家，也是不遗余力的。包括美国共产

党在内的一些国家的革命政党接受苏联的资助也是公开的秘密。所以问题不在于在互挖墙脚中哪一方的策略更高明，关键还在于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国人的创造力，满足本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因此，本书系重点讨论几大体系的内部发展上。

那么，俄罗斯有没有走“和平演变”的道路的可能？例如第一次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否必然要发生，克伦斯基政府是否有可能站住脚？若然，俄罗斯有没有可能沿着议会民主道路发展资本主义？其结果会如何？第二次，到了80年代末，苏联是否还存在渐变的可能？联邦的解体是否是历史的必然？在经济改革上，

人们对“休克疗法”议论纷纷，但是到了这个地步，是否存在像中国那样渐进的改革条件？当然，对已经发生的历史是很难假设的，不过在探讨问题时也不妨作一些假设。“俄罗斯分册”的作者冯绍雷倾向于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说东西结合部的文明造就了俄罗斯的特点，发展到本世纪初，社会结构中没有中间阶层，各种矛盾激化的程度使得客观上议会改良难有成功的余地。到戈尔巴乔夫时，一切已经太迟，戈氏实际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回天乏术；叶利钦及其谋士们也绝不是无能之辈，不能认为他们就是无视本国条件盲目追随美国经济学家的指导。局外人很难体会在那种积重

难返的经济体制中决策者所面临的艰难选择，也许俄罗斯人民命中注定要经历大起大落。当然这是从既成事实向后推理，但是设身处地很难想出另外的道路。

在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易帜之时，西方伸出双手欢迎，一方面一个劲敌消失了，一方面欧亚大陆这一大片将纳入“民主化”进程。相当多的俄罗斯人也这样看，以为从此可以与西方共享民主、自由和繁荣。然而事实绝不那么简单。外援远远少于期望，如杯水车薪；内部改制步履维艰。原来与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又逐渐恢复，而此时抗衡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西方国家一方面必须维持俄罗斯不能垮台，一方面乘人之

危，把北约的边界东扩到了它的脚下，而且肆无忌惮地用兵于东欧仅存的尚属俄势力范围的南联盟，俄罗斯周围再没有传统的缓冲地带。俄罗斯手中仍然握有仅次于美国的强大的核武器，却已形不成足够的威慑力量。如果说，命运特别眷顾美利坚，总是给予有利的历史机遇的话，那么这个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创造过灿烂文明的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却是命途多舛，20 世纪的历程更是悲剧性的。下个世纪能否摆脱新旧包袱，终于走出困境获得新生，尚在未定之秋。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俄罗斯在何处定位，扮演什么角色，也难以逆料。但可以确定的是，一个以欧亚大陆文明结合部背

景为制约的俄罗斯既不可能复归原来苏联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被“全盘西化”。

六 新时期的特点

历史阶段并不一定是按世纪划分的，国家内部的历史阶段也不一定与国际关系的阶段相一致。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还是 19 世纪国际政治的延续，新时期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开始。其标志如下：

一、欧洲的“两化”：“边缘化”和“一体化” 这是“欧洲分册”作者陈乐民的观点。“边缘化”是指从 19 世纪的中心地位移至“侧翼”；“一体化”则是把“欧

洲统一”的古老观念落到了实处。尽管困难重重，却是本世纪的一大创举，并与全球化的大趋势相一致。一种跨国界的主权国家的联合体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学 and 经济学将是欧洲对未来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二、德国问题的解决 德国既对欧洲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又是两次世界大战之源。德国法西斯的兴起和灭亡使德国，从而使欧洲，进入一个新阶段。法西斯主义兴起在德国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和思想根源。而德国法西斯的最终失败先使西部德国最终纳入了西欧的民主进程，在制度上一致起来，使德国不再是欧洲的“问题”。至于冷战中的

德国分裂而造成的“德国问题”性质与以前的不同，这一问题以柏林墙的倒塌而结束。法西斯德国的失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权的垮台，而是一种思潮的终结，是德意志民族主义恶性膨胀到极点之后的消亡，从此德国与西欧民主国家步调一致，理顺了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19世纪西欧格局。如果没有德国的这一变化，西欧一体化的进程就没有可能。

三、“第三世界”的出现 殖民体系瓦解，出现了一大批新独立国家，构成“第三世界”。这一名词有多重含义：最初指中立于西方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一批中立国家；现在则泛指欧美

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不论其定义如何，这无疑是 20 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新现象，它使世界地图必须重画，国际力量的消长有所改变，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平等的国际机制有实现的可能。还有一项深刻的影响是在国际关系中置种族主义于非法。最后一点对人类思想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的弱肉强食还常常是以赤裸裸的“种族优劣论”为理论基础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固然如此，欧美民主国家对待“非我族类”也是如此。美国的种族主义实际上也带有世界性。所以二战之后种族平等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原则，应看作不但是国际关系史上而且是人类

思想史上的深刻革命。

四、核武器的发明 这是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划时代的飞跃产物。核武器既是毁灭人类的威胁，又是制止世界大战的因素。整个下半世纪各大国都在为对付这一自己创造出来的怪物而伤脑筋，核军备竞赛与核军备控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题。

五、“信息时代” 这是计算机的发明、完善和普及的结果。以后又发展到“网络时代”。“后工业化”这一名词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但是“后”以后是什么，当时还不明确，现在基本上达成的共识是称之为“信息时代”。这也是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一样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与前一发展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席卷全球的，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有些国家能够长期处于工业化进程之外。这一变化带有划时代性质，深刻地改变着国家关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犯罪模式。但是并不等于说各国和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可以缩小，相反，信息本身成为一种财富和权力，它一方面迫使世界各国趋同，一方面又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扩大先进与落后、贫富悬殊的新动因，这也是一个悖论。

六、国际合作解决问题体制化 这首先是指联合国的出现，还有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等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及其规则的确立。这一机制建立在二战后新的国际关系和新的观念基础上，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和平不可分割、市场一体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对人类休戚相关的承认。这与美国霸权既矛盾又一致。联合国及一系列的国际经济组织实际上都是美国发起，并在美国“领导”下制定规则，然后由成员国讨论通过的。但是一旦通过，就属于所有参加者。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在维护和平、调节争端、监督国际协议的执行，解决难民、贫困、卫生等遍及全球的问题方面做出了无可代替的贡献。美国一方面在其贡献中占最大份额，同时也利用这些国际组织实施

自己的霸权，甚至在不能操纵时撇开它行事。一个有强制力的世界政府尚属不可企及，但是目前的国际机制不论有多少局限性，还是能对强权政治有一定的制约，随着国际相互依赖日益紧密，这种机制只能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而不会倒退到无序状态。

七、美国霸权 现在有多种提法：“美国领导”、“美国世纪”、“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霸权主义”、“超级大国强权政治”，等等。归结到一点，就是美国在20世纪崛起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后又成为唯一超级大国。

七 民主与霸道

在有关美国的对外行为中，作者用了一个提法，就是美国“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道”。这就是要强调，源于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内部的民主制度和渐进的改良精神与它的国际行为并无必然的联系。美国任何当政者在国内必须受制于一整套制衡机制，在国际上却凌驾于一切规则之上，包括它自己参与制定的规则。它凭借超强的实力软硬兼施，迫使他国服从其战略利益，甚至不惜大规模动武，这就是“对外行霸道”。

在我国相当普遍的认识是，一个倡导自由、奉行民主制度的国家理应在国际上也遵守和平和公理，否则就说明所谓的民主自由都不足取，或者说都是假

的。甚至于把我国应走什么道路，提倡什么原则与有关国家如何待我联系在一起。一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这个问题上有难以分解的情结，导致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道路。对这种心情最生动的概括是：怎么先生老打学生？于是决定转而以俄为师。但是结果如何呢？姑不论俄国的榜样如何，这位老师难道就不欺侮学生了吗？平等待我了吗？时至今日，应该可以对这个问题作理性的、客观的分析。一方面，自由民主是一种思想理念，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代表文明发展到某种程度时人的共同的追求。它虽然肇始于欧洲，却非哪个国家所专。这种理想付诸实践要有一定的条件，需

要长期的发展过程。各国所处环境不同，当然过程各异，难以强求一律。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国际事务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占主导地位，也就是为强权所主导。不过 20 世纪毕竟与 19 世纪有所不同，前面诸点已经提到。当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是强权政治的实行者。与其说这反证了民主自由之不足取，毋宁说正因为这些国家对内有一套足以使其富强的思想和制度，才有资格在国际上称霸。这里是讲客观事实，并非提倡凡国家强大必然行霸道。但是如不富强则不论称霸还是主持正义抵制霸道都没有力量。我们的祖先一个半世纪之前已经承认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优越性，

但是对于深层的探索，似乎始终走不出作茧自缚的怪圈。历史包袱太重固然是原因之一，而在认识上总是把我们自己的追求与国际关系的起伏连在一起，有很大关系。

八 关于全球化

“全球化”的进程非自今日始，有的论者认为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已经开始了。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必然带来全球的扩张。但是这一提法成为全世界的流行语却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事。二战以后贸易、投资、生产、金融的国际化与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全球化成为新的现实，而冷战的结束最后打

破了人为的壁垒，同时高科技的发达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大大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使每一个国家都不能自外于它。在许多方面，人类真的到了休戚相关的地步，对他人的苦难既不能坐视，更不能幸灾乐祸。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和国际社会的反应是对此最好的注解。毋庸赘言，全球化的动力来自高科技发展本身的趋同力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扩张。它所到之处带来巨大的发展，也带来巨大的问题和矛盾。其中至少有以下三个突出的问题：一、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 根据联合国最新的调查结果，全世界最富有的三个亿万富翁的财产加起来已经超过了最不发达国家中六亿多人口所

拥有的财产。而这种荒唐的不平等现象正是时间缩短、空间缩小和边界消失的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一国内的问题可以通过政府干预进行改良，而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可比的机制。在所谓“赢家通吃”的规律下，一些国家和民族可能境遇更加悲惨，有些国家被淘汰出局，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二、民族主义的突起 冷战结束后被意识形态掩盖的民族主义突显出来，纷争不已。应该说，民族主义是民族感情政治化的表现，是与民族的诞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因此往往不是很理性的。民族国家起源于欧洲。欧洲国家经过了几百年的争战、磨合，各民族的要求得到

充分的释放，民族利益大体上达到平衡和满足，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并大体相同，才有今天联合的可能。但是仍有少部分民族矛盾并未得到解决，各自的历史愿望并未得到满足，因而还在继续争斗不已。冷战时期暂时被更加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分野人为地压制下去，或加以掩盖，一旦这个盖子揭开，原有的纷争就变本加厉地爆发出来，甚至恶性膨胀。苏联的解体也与此有关。至于欧洲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其民族愿望长期受压制，刚刚有机会得到伸张，发展极不平衡，历史遗留的矛盾和问题极为复杂，自然就要顽强地表现出来。更何况大多数情况还有大国强国的利益和野心卷入

其中，使问题更加复杂。

三、霸权主义的伸张 在对峙的一方失去抗衡力量后另一方更加肆无忌惮。在世纪末到来时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同时集中体现在巴尔干地区的烽火中。

关于全球化，当然离不开美国。毋庸讳言，美国以其科技、经济和制度的领先地位“领导世界新潮流”，也就是在全球化中起主导作用，这是客观现实，不以哪个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或“智能经济”中，美国比在工业经济中更占优势。全世界在不知不觉中追随美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影响。这是一种无形中的“美国化”，连欧洲也不例外。理论上各国

主动权，迎之拒之操之在己，不少国家也制定了许多保护民族“特色”的政策。但是实际上在市场一体化的潮流中，在相当程度上是身不由己的。特别是后进国家，面临两难抉择：盲目追随当然不足取，而过分强调民族特色则可能保护落后，自外于世界潮流。这种“领导”对世界是祸福相倚，不可一概而论。几百年来，美国对人类并非没有做出过积极贡献，今后也仍然应该而且能够对人类共同的问题担负义不容辞的国际责任。但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上也可以起极大的破坏作用。

它所领导的“新潮流”不等于“好潮流”。全世界身不由己地追随的榜样未

必是好榜样。一种情况是西方文明的诸多优秀传统本身正在发生异化；一种情况是本来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任何一种文明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对外人来说，吸收精华需要进行艰苦的努力和具备吐纳的能力，而以不可抗拒之势弥漫于世界的却往往是糟粕部分居多。近年来，所谓世界“多极化”之说甚为流行。但是客观地审时度势，这最多是代表一种主观愿望，或者一种未来可能的趋势，目前还不能算是既成事实。试看哪一种力量可以称为一“极”？欧洲、日本、俄罗斯各自都可能与美国有矛盾，但不足以与之抗衡，更不可能联合抗美，而是相反，在他们之间有矛盾时，有可能

各自借助美国的力量，引来美国的干涉。在外部没有足够强大的制约力量、内部人民的制约力量也在削弱的情况下，美国的干涉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将进一步发展。这是值得世人严重关切的。

九 新课题呼唤新思维

20 世纪的确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和大灾难，诞生于 19 世纪甚至更早的重要思潮各自占领舞台大显了一番身手，在解决人类对发展和平等这两大追求中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是问题依然严重地存在。老问题以新的形式出现，同时又出现新的问题。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

进程，不是哪个国家的主观意愿的产物。但是这一过程是否能给世界广大人民带来和平和福利，则取决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和蛮横的霸权主义这两种力量能否得到有效的抑制，也取决于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和平等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此外，人类如何以自律的精神驾驭飞速发展的高科技也是重大课题。就以环境污染来说，这可能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超过迄今为止的战争和平、贸易摩擦等带来的影响。不但地球上的水和空气被污染，连天空、太空也正在以危险的速度被人类所污染。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个世纪人类所面临的生死存亡问题将是自己亲手造成的生存环

境的破坏，这是不分国界的。明智的选择应是联合起来共同拯救和改善环境。但是发展的不平衡和环境的暂时差异，造成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和全局之间的矛盾。决策者不见得都那么明智，即使是明智的决策也不见得能在盲目的群众中贯彻。到那时真正的英雄可能不再是战场上的军人，或是以其他方式保卫某一个国家的狭隘利益的人，而是对保卫环境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人。如1998年戈德曼环境奖获得者之一，以部族集体自杀相威胁来阻止西方石油公司在哥伦比亚雨林中开采石油的领袖，其英勇悲壮也可以入史诗。这只是例子之一。

总之，进入下一个千年，人类面临的是如何使自己的高度智慧和创造力造福而不是加祸甚至毁灭自己。20 世纪最后十年的发展可能预示着一种质的变化。在思考世界面临的问题时，也需要目光超越传统的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乃至意识形态的观念。新课题呼唤着新的眼光和新的理论。本书系意在鉴往知来，希望能得出一些启示。尽管着眼于世界，却总忘不了我国在这世界大潮中何以自处，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有题为“中国与全球化”一文，作者陈乐民的结论是：“至于我们中国自身，则改革和开放是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的。今天如此，明天如

此，以后仍如此。可以说是我们的‘永恒主题’。”

这句话不是官腔，不是老生常谈，而是本书系作者们审世界之时，度我国之势，得出的深切感受。

（2000年）

才自清明志自高，
生于末世运偏消

***当时中国人才奇缺，顾在业务上成为不可或缺之人，而意见却往往不见用，对于风华正茂、颇想在外交界一展抱负的青年才俊来说，难免有委屈之感。事实上，这件事差不多为顾维钧以后的漫长的外交生涯定了调，那就是“委曲

求全”，他的才华即使发挥作用，也只能用于修修补补，无法改变大局。

重读《顾维钧回忆录》有感

顾维钧（1888—1987），近世中国名闻遐迩的杰出外交家，和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处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十六岁赴美留学，191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是我国早期极少数受过正规国际法教育的职业外交官之一。从辛亥革命第二年就在外交界任职，直到1956年辞去蒋政府“驻美大使”之职（1956—1966年，顾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这一段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将近半

个世纪。

顾维钧在获得学位之前就已得到政府的招聘，在美国导师的支持下，赶忙通过论文，提前完成毕业手续，于 1912 年回国到民国政府外交部任职，时年二十四岁。当时孙中山刚让大总统之位予袁世凯，总理是唐绍仪，外交总长是陆徵祥，外交次长是曹汝霖。1916 年，顾二十八岁时出任驻墨西哥公使，后任驻华盛顿兼古巴公使，可谓少年得志。他崭露头角是在 1919 年巴黎和会上，作为资历最浅的代表，为中国收回山东领土表现了非凡的勇气、识见和才华，从此奠定他在外交界的声誉。应该说，他是近世中国罕见的外交高手，而又与有些

暗于中国国情的“洋博士”不同，对内政处理圆熟，略无书生气，在派别斗争激烈、政府更替频仍以及人事关系复杂的中国政界能保持相对超脱的地位。历届执政者都要借助他的国际声誉和才干，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对他礼遇有加，委以重任。因此他作为外交官服务的政府之多，在职时间之长也是罕见的。他见证了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和北洋政府的频繁易手，经历了北伐、抗日和内战，还有两次世界大战。他在外交官生涯中与列强周旋，力保中国的合法权益，而且善于提出在当时客观条件下对我国最有利的方案，有时强硬，有时妥协，一般说来审时度势，进退有据。

其特点是知己知彼，重实际而不凭意气，在内忧外患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可谓以其昭昭处其昏昏。他的自述《顾维钧回忆录》较之一般回忆录都客观、冷静而翔实。当然，整理者花了许多心血，功不可没。但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详记工作日记，或记忆如此清晰，对史实如数家珍，也不多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作风之严谨。这部《回忆录》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珍贵参考资料，自不待言。

顾维钧根据丰富的实践，总结出以下一些外交原则，在当时既有针对性，对后世也有普遍意义：——必须非常敏锐，遇事绝不能想当然，不能仅看表面。

必须非常谨慎，仔细观察，小心从事，并永远瞻前顾后，有进有退。（这一条针对的有关事例是，巴黎和会结束前正当中国代表竭力要求对山东问题保留，表示可能不签字时，代表团的第一、二把手应会议要求先交出了印章，造成准备签字的印象。）

——需要知己知彼。这是针对“中国大多数军人，尤其是军阀，只想了解其对手及可能的敌人，而不知道本身的弱点，结果造成毫无根据的希望和野心”。

——在外交上不能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原则，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的成

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那就无法达成协议。……“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为口号，那是永远成功不了的。（指巴黎和会后国内群众运动的口号，以及后来华盛顿会议时黄郛提出立即收回山东铁路的主张。）

——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则，要么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政治野心，要么使谈判完全破裂。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民国初期，不同的政治或军事派别依附某一外国势力来支撑其政治

前程，就沦为某一外国的外交工具，难以向人民交代。“五四”以后，又以群众运动对外交代表团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后果。

这些原则堪称深入浅出，貌似简单而内涵深厚，而且处处针对当时的中国国情和时弊，非时下一些故弄玄虚、空而无当的各种“理论”所能比。有这样的人才应是国家之幸。但是他身处的是一个动荡不安、支离破碎的中国，所奉职的政府大多腐败而软弱无能。作为后来的读者，回头看他的自述，大多数情况下事与愿违，往往客观上并不能起到真正维护中国人民利益的作用。他所遇到的困境，除了国力衰弱的大背景外，

大体上有两种：一是后方政局动荡，内部矛盾重重，处处受到掣肘，无法放手对外；二是他所服务的政府及其政策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于是出现这样的悖论：他对外交涉越成功，客观上对中国越不利。顾维钧本人的爱国心、人品和忠于职守都是没有疑义的，若论个人名位和际遇，他没有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常有的“怀才不遇”之叹，应算得幸运；而以真正为国为民成就的事业计，他却生不逢时，才能和心计多半空抛，到最后为蒋政权服务的十年，也违背了上述最后一条原则，实属不幸，这是一个悲剧。

仅根据《顾维钧回忆录》所提供的

事实，从“悲剧”的角度，可以理出三种情况：一、屈辱外交；二、内部掣肘；三、在分裂的中国，外交努力实际上服务于政治派别。

一 屈辱外交（1）

顾维钧在袁世凯政府中最早接触的外交交涉是中英关于西藏和中俄关于蒙古的谈判，结果以中国向英国和俄国退让告终。紧接着是臭名昭著的与日本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

（一）二十一条这是顾维钧在外交界奉职伊始参与了全过程的第一件重大交涉。1914年8月，袁世凯得知日本突然在龙口登陆的消息后，仓促召集议事，

顾与伍朝枢作为国际法专家与会，二人都认为根据国际法绝对不能默认，应坚决抵抗。其他在场者都支吾其辞。袁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军队能抵抗多久，段曰四十八小时。袁叹气说，他明白法学家的意见是根据国际法来决定我们应该怎么办，但是没有力量。国际法是人定的，中国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定自己的国际法。于是决定援日俄战争之例，在自己的领土上给他国划出“交战区”。顾被指定为此项屈辱性的政府声明三个起草人之一，尽管他自己不同意其内容。以后他被迫执行他本人不同意的政策和起草文件尚有多次。

日本迅速占领了德国租借地之后，

得寸进尺，控制了青岛至济南的铁路。紧接着于1915年1月提出二十一条。袁为取得英美等国的支持，把顾列入谈判代表团之内，而又屈从日方坚持的意见，只由两国外长带一名秘书面谈，把顾排斥在谈判之外，不过顾参加了全部幕后磋商。此时，顾的意见和当局一致，就是尽量利用美、英在华利益，争取其制约日本，他负责与英美公使馆保持接触，向他们透露情况，以打破日方保守秘密的要求。此一策略得到的结果是，在英美支持下拒绝日方提出的第五条。此时，顾因病住院，起草复文却非他莫属。他的原稿中拒绝第五条的口气坚决，最后被改成他所不赞成的“容后再议”。条约

签字后，顾主张立即发表声明，说明谈判经过和拒绝第五条的原因，以给后世历史学家留下记录。这一声明的起草又落到他头上，当时他发高烧，在医院中向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口授英文稿，再译成中文。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才奇缺，顾在业务上成为不可或缺之人，而意见却往往不见用，对于风华正茂、颇想在外交界一展抱负的青年才俊来说，难免有委屈之感。事实上，这件事差不多为顾维钧以后的漫长的外交生涯定了调，那就是“委曲求全”，他的才华即使发挥作用，也只能用于修修补补，无法改变大局。

（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1944 年，在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举行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实际上是成立联合国和通过联合国宪章及重要规章制度的最后筹备会议。中国与美、英、苏并列为发起国之一，应邀参加。顾维钧被任命为代表团团长与会。照理，此时中国的地位与一战以后的巴黎和会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应是扬眉吐气的机会，为何本文把它列入“屈辱外交”项下呢？且看下面的经过：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当然十分重视。在派代表团时，蒋介石对跃跃欲试的孔祥熙不予理会，并排除了其他人事排名的考虑，亲自任命顾为团长，明确表示就是倚重他的业务能力。同时，中国代

代表团阵容强大，如胡适和国际法专家周鲠生等都包括在内。当时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要借此难得的机会申述中国的立场，尽可能多争得一些权益。顾维钧已有参加“国联”工作的经验，重视国际组织或某种国际机制的作用也是他本人一贯的主张，是他外交思想的一部分。他自称是“中国政府中第一个敦促国家关注此问题的人”。在接到任命后，确实很高兴，他于1944年8月28日抵达华埠，立即投入制订中国拟向会议提出方案的准备工作。

一 屈辱外交（2）

但是，中国要取得与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没有那么顺利。从预备会议开

始就受到歧视。主要是苏联坚决不同意与中国一起开会，其理由是苏联与日本有中立条约，故不便同与日本作战的中国坐在一起。按此逻辑，美、英也在与日本作战，又当如何？实际是苏联始终不同意承认中国战后的大国地位，这点在1943年莫斯科外长会议上都已经表达过。按照斯大林的意见，中、法都没有资格，战后安排只应由美、英、苏三国决定。丘吉尔本也不同意要中国，但支持戴高乐的法国。只是美国坚持联合国发起国要包括中国，并以否则将减少对苏援助相威胁，莫洛托夫才不坚持反对，丘吉尔也勉强同意。但是关于发起联合国的“四国宣言”刚一发表，即在苏联

建议下作了“非正式”的三国协商安排，还是把中国排除在实质问题的磋商之外。关于这段时期苏、美、英各自对中国的立场背景，笔者另有文章详述（见本书《大国保证和平的原则与大小国家平等的信念》一文）。总之，中国代表团到了敦巴顿，苏联坚持不与中国同席。会议东道主美国曾提出过妥协方案：同时开两个会，一个有苏联无中国，一个有中国无苏联，两个会议的会场在两间相连的房间，中间的门可以敞开。这个方案可谓煞费苦心，既迁就了苏联，又照顾了中国的面子。但是苏联仍坚持不同意，连两个会同时开都不行。结果两个会分两个阶段进行，但是在时间上简直不成

比例。

第一阶段，美、英、苏三国会议已于8月21日（顾到达前一星期）开始（实际非正式磋商于8月2日就已开始），一直延长到9月27日，中国代表团在会外足足等了一个月，所以顾说是对“忍耐力”的考验。更有甚者，在此期间，会议情况向中国保密。只有美国与会代表以与顾维钧私交的关系，秘密“透露”一些情况，条件是顾必须承诺不向重庆政府报告，因为怕苏联知道后退出会议。这种荒唐而尴尬的局面足以说明中国当时的实际地位。美英当时如此迁就苏联，主要是因为要力促苏联对日开战。

“第二阶段”，9月29日开始，至

10月2日就结束，实际上只开了三天，显然只是做做样子。前一个阶段之所以拖得这么长，是美英与苏联之间有一些分歧问题，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如果中国对他们好不容易已经达成的协议提出任何异议，美英都要重新与苏联磋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方面也暗示，与中国一起开这样一个会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声望”，而不是听取中国的意见。说白了就是：已经给你面子了，该识相点下台阶了。深谙世事的顾维钧当然懂得这一点，所以尽管他有丰富的国际组织的经验和出自维护中国权益的考虑，率领代表团成员精心准备了七点意见，却只能转而说服自己的同事不要坚持讨

论拖延时间，以“全力促成会议成功”为基本态度，仅象征性提了几点缩减到最低限度的“补充建议”（根据美国档案，这些建议都“不重要”，未纳入最后公报）。此中的苦衷是由于苏、英都反对中国的大国地位，只有依靠美国支持，但美国更需要苏联，因此必须知趣，不使美国为难。这一态度受到美国的“赞赏”。

即便如此，到最后如何发表会议公报还发生了问题，关键还在于对两个阶段的会议如何处理。美方先答应愿发表两个公报，如实反映两个阶段的会议；后英国建议只发表第一阶段英美苏会谈结果，美国转而立即同意英国的方案。

不过英国的草案中最后提到“四国政府达成协议……”，而苏联只同意提“三国政府”，显然仍排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形成僵局。最后还是顾维钧提议干脆去掉关于三国或四国的一段，公报才得以获得四国政府的批准，于10月9日在四国首都同时公布。最后文本中的提法是“有代表参加的各国政府……”所以，表面上，中国号称为发起联合国的“五大国”之一，实际上只处于敲边鼓的地位。在整个过程中，顾维钧又是极尽委曲求全之能事。

一 屈辱外交（3）

（三）1950年台湾当局对日“和约”

无庸赘言，台湾当局片面与日本谈

判和签订“和约”是美国一手操纵的。整个过程和结果都是非法的，在中日建交之后就自动失效。这里只从顾维钧的角度谈他在谈判过程中的处境：首先，顾虽然持反共立场，但对战后蒋介石把反共放在第一位而对日本侵略者宽大无边心中是有所保留的。他说：“对日本不进行报复的政策，在日本投降并解除武装后就开始了，并在决定支持日本完全重新武装时达到高潮。这原是蒋委员长的主意，并由他下达命令付诸实施的，根本不能代表中国的公众意见……委员长……用他在国内的权威地位和巨大影响，把这一政策强加给国家。实际上这是违反人民的意愿的。” 但是在就对日

和约问题与美国谈判时，顾已经不反对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武装日本的原则，只是要求照顾中国人的情绪，不要“白纸黑字”太明显。

对日和约是冷战高潮中的产物，当时也正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美国对台湾政策举棋不定之时。结果，受日本侵略之害最深，对打败日本出力最大的中国却整个被排除在 1951 年 9 月有 51 个国家参加的旧金山对日和会以及所签订的对日和约之外。对于这一点，海峡两岸的愤慨是同样的。美国提出的方案是，在多边和约签订后，日本单独与中国缔约，并由日本自己决定“选择与哪一个中国缔约”。不言而喻，日本将听从美国

旨意“选择”国民党当局。所以，予夺之权全在美国。蒋介石对于单独缔约本来就不同意，还要让战败国来“选择”，更认为是“奇耻大辱”。事实上，在整个和约筹备过程中，即使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从不主动向蒋方通报或征求意见。身为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只能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情况，并为争取与其他盟国同样的权利而苦苦与美方进行交涉。不算台美通过其他渠道的交涉，仅顾与杜勒斯（当时为国务院负责对日和约的顾问）谈话和辩论就有十几次。不过当时顾和他的属僚都意识到蒋“必须在干脆放弃对日和约和对美国的政策追随到底之间做出抉择”，而他们建议只

能选择后一条路，在这个基础上再与美方交涉，讨价还价。顾把与美方谈判的情况和这一“委曲求全”的建议报回，受到“外交部长”叶公超的“高度赞赏”。蒋介石被迫吞下了让日本“选择”为单独媾和对象这剂苦药，十分伤心，对一位美国议员说：“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但是，真正被迫吞下的更苦的药丸是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地位问题。从《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公告》已经明文规定战后日本将台澎归还中国，这也是国民政府力争来的，而且已于1945年正式从日本占领者手中接收，建立了台湾省。况且此时蒋政权已在台湾“偏安”，

自称代表全中国。美国却提出要把“台湾地位未定”的含义写入对日和约。事实上，自从中国大陆易手之后，“台湾地位未定论”一直是美国对台方案之一，只因蒋方力拒，才未能行。杜勒斯正是这一方案最热中的鼓吹者，而且进一步提出过“台湾中立化”的方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就是实施杜勒斯的方案。现在乘人之危，逼蒋接受“台湾地位未定论”。蒋如果同意，则自己在台湾立足的权利都成问题，因为脚下的土地不一定属于中国，他将变成“避难”；如不同意，美方动辄以其他国家主张中共参加缔约相威胁，而且今后自己的政治存亡都要依

靠美国。如果说，过去顾维钧在主权问题上一般都是主张力争，政府的指示往往比他的主张软弱，他被迫照办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正好相反，他审时度势比蒋更早接受对美国的屈从。1950年10月20日顾与杜勒斯一次长谈，弄清了美国对台澎的意图是：在对日和约中规定“日本放弃”对这些岛屿的一切权利，而不提放弃后归谁，拖延时间以待国际局势发展再由联合国决定。随后，他向台湾当局做了报告，并提出建议称：

一 屈辱外交（4）

窃意我政府国际地位动摇，处境艰危，目前第一要著为：（一）保持我政府[在联合国]代表权；（二）保障我台岛安

全，以待世界局势演变，转而利我。此二目的，后者亦为美之目的，前者有连带关系，我能实受其益。其他一切法律理论，实际与我有损无益，似可不必太重视。（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这一态度，与他青年时期在日本的二十一条问题上力主根据国际法坚决抗拒的立场，恰成鲜明对比。

但是事关领土问题，国民党当局不能不重视，还想作一番抗争。11 月间顾收到“外交部”根据“政府决议”整理的一份作为谈判依据的长篇“备忘录”，其中关于台澎问题称：此（指美国的主张）与我方所持台湾澎湖已为我国领土之主张适相背驰。美方坚持此议……自

非我方所能变更；然为维持我方民心士气起见，我于美方主张自亦未便竟于苟同。换言之，即惟有各持己见，而在其他方面另谋合作。

这是代表国民党内部多数人的意见。但是，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美国态度已决，不“苟同”也无用。于是，国民党方面又退一步，要求把台澎与库叶岛、千岛群岛同样对待：如果前者不提日本放弃后的归属，那么后者也不提，否则就是对中国的歧视。但是这点面子也未能保住，在多边和约中还是明确规定后者归苏联，否则苏联是不会答应的，而对台澎则不提归属。蒋方原来还准备最后一着：在条约签字时发表声明，表

示台澎属于中国，这是事实，不需要任何手续来加以确认。但是，美方连这一台阶也不给，又要顾维钧向台湾当局及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打招呼，不要公开反对美国立场。这样，蒋介石尽管极为“恼怒”和“愤慨”，连确认台澎属于中国的声明也不敢发，等于默认了“台湾地位未定论”。

这件事从1950年4月杜勒斯与顾维钧谈话首次正式提出与日本单独签订和约问题起，到1952年4月27日蒋日“和约”正式签字，前后共两年。因系美国一手操办，其中一年半的时间是与美方谈，基本达成协议后才与日本谈。也就是美国先对台湾当局施加压力，然后再

压日本接受美蒋已达成的原则。所以前期谈判大部分在华盛顿进行，顾维钧处在第一线。顾自从进入外交界，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对付日本的侵略野心，历尽艰辛，其主要策略思想之一是联美制日。然而此时他所面临的美国大政方针却是扶日反华（大陆），蒋政权已处于其战略边缘，随时可以抛弃。顾对这一点心中有数，又只能“委曲求全”。他向杜勒斯表明：“虽说中国人不会轻易忘记日本侵略和他们的财产所遭受的损失，他们接受日本作为共同反对共产主义斗争中的合作者。”这就等于是只求能作为与日本缔约的对象，已没有可守的底线了。显然，此时他绝不能代表“中国人”说

话了。大局如此，他与美方的交涉中备受压抑和屈辱是可以想见的。尽管他一直以美国为友，此时也体会到“连美国的政策也受到强权政治的支配，权宜之计压倒了道义原则和国际正义”。

二 内部的掣肘（1）

“弱国无外交”，这是中国人近代以来最深切的感受。但是一般把“强”、“弱”只理解为军事力量，所谓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其实并不尽然，因为即使处于军事优势的国家，要下决心打仗还是需要许多条件的，而且互相打交道的不止一个国家，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未始不可以利用。从某种意义上

说，弱国更需要外交，如果处理得当，不一定不能靠外交争取到在现有力量对比下，能够达到对自己有利的最大限度的协议，或者至少争取到缓冲的时间以便蓄积力量。但是这里的必要条件是决策集团判断正确，思想一致，加以有高明的外交能手，前台后台同心协力。顾维钧之为“外交能手”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他遇到的难题往往“内交”不亚于外交。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之“弱”是全方位的。

（一）巴黎和会顾维钧一举成名是在巴黎和会上。他在山东问题上为维护中国权益步步为营，据理力争，慷慨陈辞，使在场者为之动容。最后公理终究

敌不过强权，中国代表拒绝在决议上签字。这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上是在劣势中维持了严正立场和国家尊严，顾的表现出色而悲壮。此事众所周知，不必赘述。这里要讲的是另一个侧面——“将在外”，后方是怎样一种令人扼腕的混乱情况。

顾从一开始就以其外交敏感性，意识到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正是绝好时机，我国应该准备好在会上向各国鸣不平，以恢复某些失去的权利，特别是反对日本强加于我的二十一条。为此，他在驻华盛顿公使馆内成立专门小组，收集、研究、汇报情况，列问题单子，向国内提建议等，不遗余力，可谓克尽厥职。

但是以后每一步都遭到令人沮丧的挫折：中国参加巴黎和会，首先遇到的是组团问题。西方国家起初口头表示将对中国以大国相待，这意味着可与其他协约国主要成员一样，派五名全权代表。中国政府遂按此规格组团，团长外交总长陆徵祥已经非正式地分别通知了五位人选。但是到和会正式决定时，却把中国列为“三类”国家，只能派两名全权代表。中国驻巴黎使节虽向东道国力争，都无结果。这一来，致使内部人事处于尴尬境地。原定全体代表团成员只待都到达巴黎，到达后第一件事就是交涉席位问题。实际操纵会议的西方列强对全权代表名额坚不让步，只允许每次出席会议

的人可以不一样，于是中国内部仍任命五位为全权代表，轮流参加。这一难题虽然解决，代表团又为内部排名问题大伤脑筋。因为团长陆徵祥已是老病之躯，连出席会议都不能保证，名列第二的代表实际上就要经常代团长出席表态、临场决策等。论能力，非顾维钧莫属，但是他的资历最浅。还有，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王正廷自以为代表南方，理应排在第二。陆排出的名单依次是：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深谙中国官场政治的顾维钧对此已感不安，要求排在第五；谁知随后接到国内电报由“大总统”任命，顾排在第二。果然此事引起其他代表的不快，使顾维钧的处境更

加为难。

和会正式开幕是1919年1月18日，中国代表团于1月12日凌晨才到达巴黎，那是因为代表团人数众多，加以照例家眷及随从人员队伍庞大，以致同时买船票发生困难，最后只能绕道美国到欧洲，却因时间紧迫，不能乘便到华盛顿与美方从容磋商。在会前已经相当紧迫的时间内，别国代表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会议事宜，中国代表团却浪费在人事排名和内部摩擦上。第一次与中国有关的实质性会议是应邀参加1月28日的十人预备会。中国代表团仓促接到通知称，日本已先在预备会上讲了对山东的立场，中国可派代表陈述中方立场。这本是中国

参加此会的主要目的，应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但来得突然，团内毫无准备，慌了手脚。团长陆徵祥竟称病放弃领导，让团员自己决定谁去。下午三时开会，到两点钟还在为论资排辈问题推来推去。最后只因别人都无准备，遂公推资历最浅的顾维钧去阐明中国观点。顾也的确早有准备，这次会上他果然不负众望。

二 内部的掣肘（2）

在此之前还发生外交文件箱在运送途中遗失事件，使中国代表团应提交会议的文件重要附件文本不全；更有到临时连懂得如何包扎送各国代表团的文件的秘书都没有，由顾亲自指派人员购买包扎用品，等等，“后台”之混乱为其他

国家所无。

在这期间，国内各派势力纷纷来巴黎观战，各怀不同目的，向代表团施加压力。代表团内部争权夺位之争日益激烈，由暗斗变成明争。更为荒唐的是，2月初，团长陆徵祥忽然临阵脱逃，去向不明，谁也打听不到其下落，代表团出现领导真空达一个月之久。3月上旬陆又返回，带着北京政府对他外交总长的重新任命和任代表团“总裁”的电报。显然，他是躲在欧洲某个角落与北京联系，要求加大其权力。但是这并不能减缓代表团内部矛盾，而且愈演愈烈。顾还曾被造谣与亲日派曹汝霖之女订婚，引起顾与王正廷公开反目。凡此种种，不一

而足。

巴黎和会的最后结果引起国内群情汹涌，中国代表团迫于形势拒绝在协议上签字。这原是顾一贯的主张，团长也同意。但就是这一拒签的决定还不是国内正式指示。陆徵祥向国内一再报告，要求改变原来签字的指示，重发拒签训令。国内始则要陆自行决定，继则不予答复。代表团拒绝出席和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举动，实际上是先斩后奏。待会议闭幕后忽然收到国内电报说早已发出过电谕，为何没有收到云，却仍未明确说明该电报是否指示拒签，只能理解为默认既成事实。顾维钧分析，这是北京的当权者受到内外压力，不愿在这个

重大决策上负责，就这样含糊过去了。这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对待这样重大问题的态度。

总之，外有强权欺压，后方昏庸虚弱，内部矛盾重重，工作秩序混乱。在此情况下，保持表面上一致对外都很勉强。如果只是军事力量暂时处于弱势还可以弥补，而这种中国政治特有的弱点是根本性的，无论多高的外交才能也莫可奈何。

（二）1922 年华盛顿会议这次会议顾与施肇基、王宠惠三人被任命为全权代表，施肇基排在第一。中国代表团照例庞大无比，包括各部各党派代表，有一百三十人之多，外加若干比全权代表

更加资深的高级顾问，其任务不是顾问外交事务，而是吸取巴黎会议的教训，在代表内部发生纠纷时进行调解（！），足见中国之“内交”何等重要。

对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山东问题，其中核心是从日本手中收回胶济铁路。日本的理由是它接管了德国的财政和经济利益，包括其给中国贷款的债权，也就是占有铁路的权利。中国的方案是偿还贷款（2500 万银元）收回铁路。日本则坚持延长贷款期。顾在会上振振有辞地说“任何国家坚持让别人接受不需要的贷款都是不合情理的”，此语博得与会者的同情和赞赏。但是会后却发现国内拿不出这笔钱来还债。代表团收到

国内许多来电都主张立即偿还贷款，并纷纷允诺捐款，实际上大部都不能兑现。结果还是只得同意接受日本以贷款方式占有铁路，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为期五年的协议。但是，代表团内外都有强烈的不妥协意见，要求“借款赎路”立即收回（实际借不到款），坚持铁路全体管理人员应为中国人，指责前线谈判代表的妥协为“卖国贼”。正当中国代表在华盛顿艰苦谈判，争取由中国人任车务长接近成功时，北京新总理梁士诒上台，他接见日本代办，公开说中国的新政策是“借款赎路”，结果日本态度重新转为强硬，中国最终不得不接受日本人任车务长。北京政局混乱，政令不一，在华盛

顿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却消息闭塞，对北京的情况只能从美、英那里打听到。

二 内部的掣肘（3）

军阀混战中的北洋政府，在国际上形象不佳是可以想见的。顾对于有政治野心的中国人总是想取得某一外国的支持感到“可悲和痛心”，而他作为外交总长必须粉饰太平。他在1922年就财政部长罗文干突然被捕一事质问黎元洪总统的信中，就说自己“力图使国际上认为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是个法治国家”，发生这种事使他为难。使他为难的当远不止此一端。

（三）九一八事变与李顿调查团统一以后的南京政府又如何呢？北伐以后，

顾辞职在野一段时期，很快又为南京政府所起用。第一个重要职务，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奉派任李顿调查团的中国顾问。在此期间，顾备受日方冷遇、歧视、排挤，直至生命威胁（收到炸弹邮包）。顾表示不惜以身殉职，坚持到底。顾在调查团中力陈中国受害事实，为争取调查团至少对事实真相和性质有相对客观的认识，煞费苦心。

1932—1941年，顾任驻法大使期间曾兼任日内瓦国际联盟行政院的中国代表，另外两名代表是颜惠庆和郭泰祺，颜排在第一位。国际联盟当时的首要任务是调停中日冲突。交涉的焦点还是李顿报告书。中国政府希望借助“国联”

将问题公之于世，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同情，或者还能得到某些物质和政治利益。这本也无可厚非。问题是自己不作抵抗，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斡旋上，是蒋介石政府的致命弱点。日本蛮横强硬，美欧态度犹豫暧昧。三位在前线的代表可谓齐心协力，为争取国际公道不遗余力，最后的国联报告书在当时情况下对我相当有利，在外交上应该算是成功的。然而于事无补。最令他们痛心的，还是中国内部的涣散和软弱。

当时国内的情况：四川刘湘和刘文辉叔侄内战，山东韩复榘与刘珍年军事对抗，北京有帝制复辟运动，还有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日本乘机大做

文章。斋藤首相告诉新闻界，和中国谈判是比满洲问题更大的难题，不知道中国政府在哪里，谁是领导。日本的策略是竭力煽动和怂恿华北的军阀宣布独立，并煽动帝制复辟运动，挑起动乱，企图把华北分裂出去；同时散布中国各地内部纷争的消息，以及英国正在支持西藏独立、蒙古军队将进入包头等流言。其目的是要把国际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内部局势上来，以便在李顿报告交付讨论时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诡辩做准备。于是三位中国代表联名于 1932 年 10 月发回了以下电报：...查十余年来，欧美列邦常感我国政局不定；中央无强固政府，内部纷乱，政令不行。九一八以还，日

本即利用欧美此种观念，在国际间极力宣传。谓我国政治紊乱，组织不足，条约义务不能履行，以期引起各国反感。此次调查团东来，日方所提说帖，关于此点，尤复反复申述。而该团亦以我国中枢分散，洛宁沪汉，形势分歧，内部亦多未充实引以为憾……惠（颜惠卿）等日来在此历访各国代表，亦多以我国无强固政府，形势涣散为虑。调查团报告书认为，此种情形，足以危害东亚和平，并于第九章提出以国际合作协助中国改造之建议……恐日本仍将利用此点……以期延阻东案之解决。议席之上，自当因机应付，据理争辩；但恐徒恃空言，不易生效。

电报最后提了两点建议：一是加强团结，罗致全国人才，加强中央；二是不妨采纳外人协助中国改造之建议，楚材晋用，中原不乏先例，但要采取主动，先妥定方案，以避外人干涉内政之嫌。

二 内部的掣肘（4）

这份电文委婉恳切，如实反映了外界舆论，意见句句切中要害。可谓用心良苦。从今天的尺度来看，向位居中枢者提出这样坦率的意见，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但揣诸当时的局面，也有非指出不可的苦衷，因为他们在前方当然要据理辩争，但内政如此，“徒恃空言，不易生效”。到头来承担责任和受舆论抨击的还是外交官，这是顾在外交生涯中贯

穿始终的无奈。至于最后两点建议当然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尽心而已。果然，在接到回电时，已是“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出面，原行政院长汪精卫因与蒋的矛盾称病出国就医。这更加引起各国对中国国内局势混乱的不满。

紧接着，根据外交部建议，驻外使节于1932年10月30日联名通电内战各方首领呼吁停战息争。基本精神与上述电报相同，措辞更为强烈，其中有“中国内哄不已，友我者叹息，忌我者讪笑”，

“现三省沦亡已逾一载。国如垒卵，檐将压焉”，“国将不国，更何外交之可言？我不自爱重，而欲求人援助，必不可能”

等语。

由驻外使节联名呼吁国内团结，在历史上大概绝无仅有。姑且不论造成国内局势的责任在谁，这些话确实入情入理，反映了外交人员的切身感受。当然，这种呼吁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

颜、郭、顾三人在前方与国联和各西方国家交涉周旋，费尽心机和唇舌。顾又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上发挥辩才，舌战日本代表松冈洋右，赢得好评。国际上也并非没有主持公道的力量。1933年1月16日，“人类权利同盟”在巴黎开会，与会的巴黎大学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致通过致法国驻会首席代表保罗－彭古的信，要求宣告日本是侵略者，要求法

国政府在国内领导各小国维护法律和中国的正义事业，援用国联盟约实施经济制裁。与此同时，代表们一再向国内反映日内瓦舆论：大家“希望中国能善自努力，出兵抵抗”，对中国还与日本驻华代表密谈、宴饮不理解，建议应在外交上对日本采取断然措施。2月24日，国联终于通过报告书，中国代表的艰苦斗争赢得了一定的成绩，最重要的是，报告的精神留下了可以对日实行制裁的余地。日本因此而退出国联。三人发回国内的汇报称：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总算“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并给我方以行动之自由”，“但如我国不决心依靠自己行动来坚决捍卫我领

土，则其价值即将消失，而历时十七个月之外交努力亦将完全付之流水”。以后事态发展的结果，使他们不幸而言中：报告书刚一通过，中国军队就在热河节节溃退，致使“朋友们”“看到中国军队这般软弱无能，与中国代表团在国联大会上辩论时所持的强硬态度适成强烈的对照感到迷惑不解”。三位代表连篇累牍发回电报，说明“有可能采取国际行动的先决条件是中国首先进行自助的意志和能力”，一再呼吁与日本断交和坚决抵抗。但是只见“国土一片接一片地沦丧与敌手，这样我们就只能更加招致世界的轻视，丧失友好国家的同情”。对于中国败北失地，军队叛变投敌的消息，外

交部发给代表的电报一概予以否认。但是他们刚按照国内指示发布公报否认，包括承德在内的一连串城市失守的消息即被证实。这使他们的处境极为尴尬，顾说自己感到“颇像讲坛上的发言人，台上说得天花乱坠而台下发生的事实却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况下，颜、郭、顾三人联名申请辞职。他们的辞呈充满悲愤之情，略摘录如下：……前年三省之陷，不战而走，世界为之骇异。此次热河之役，日人宣传谓我军并无抵抗诚意。松冈在国联且谓我军勇于内战，无意对外。……战线屡缩，失地频闻。友我者对于我国是否真心抵抗，群来惶问；忌我者谓我本无自助决心，国联原可不必

多事。惠等待罪海外，无法答辩。且自报告书公布后，军事方面重要甚于外交。将来外交前途，多视军事谓转移。惠等心余力绌，应付乏术。应请准予开去代表职务，另委贤能接充……

可以预料，这一辞职是不会获准的，国内来电纷纷“慰留”，外交部长罗文干电中说得更厉害：此时“若稍露分裂痕迹，正中日人之计”，而且军方会说外交官“撒娇”。蒋政府做出姿态，派要员赴东北鼓舞士气，做准备抵抗状。几位代表只好继续“鞠躬尽瘁”了。但是如他们辞呈中所提到的，日本已经看透中国政府“勇于内战，无意对外”，无所顾忌，卒至大举侵略。外交官们“鞠躬尽瘁”

的一切成果付诸东流。

至于他最后一任驻美大使期间，所经历的一个走向垮台的政府内部的种种矛盾和牵扯，更是令他常有“一国三公”之叹。其间有宋美龄赴美求援不受美方欢迎却仍逗留不归，使他为难；蒋介石认为他争取美援不力，忽派孔祥熙为专谈美援的全权代表，以至于顾以一国不能有两个全权代表为由提出辞职（此事因美方不接受孔祥熙而作罢）；还有一段时期李宗仁“代总统”，而实权仍在蒋介石手中，使“大使”不知何去何从，等等。因篇幅关系，不再一一详述。

三 外交努力与中

国进步潮流相悖（1）

大半个世纪中，顾维钧在任上无不一宵衣旰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工作，不敢稍懈。但是有时其努力的程度与民族进步成反比。举几个典型的例子：（一）1916 年芝加哥借款当时顾任驻华盛顿公使，负责与美国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谈判，成功地借得 500 万美元，并且经过他的努力，第一次摆脱了过去中国对外借款被迫接受的许多有损主权的政治性条件，为中国以后在海外筹款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这是他的得意之作。但是此时正值袁世凯称帝失败去世后，混乱不堪的黎元洪政府当政时期。借款成功，无异是为这一本该衰亡的腐朽政府

打一剂强心针，遭到包括他岳父唐绍仪在内的南方国民党人的反对。

在此期间，顾力主中国参战，认为协约国必胜，这样战后可以提高国际地位，并可解决山东问题。尽管后来山东问题没有解决，他对局势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客观上又帮助北洋政府取得美国支持，为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所反对。他在自述中说：“我对政府的建议完全是为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中一员的利益，而在两个对立党派之间，则变成了争夺最高权力的大赌注。”

(二)1926年关税余额之争顾自1922年回国，历经黎元洪、“摄政内阁”和曹锟政府，总理也换了几任，他一直任外

交总长之职。1926 年，在与南方政府争税款余额中，站在北方政府一边，把同情南方的海关总税务司长英国人安格联解职。这一次他对七国公使联合来访的质问采取了少有的强硬态度，指责他们干涉内政，拒绝做出解释。在政府中，他力排众议坚持不妥协，并把主张妥协的税务督办蔡廷干免职。最后斗争基本胜利，英国公使接受了中方的任命（易纨士）。这件事在局部是维护了主权尊严，加强了这样的信念：“只要中国立足于其合法权益的立场上，不管其行动在远东或在整个亚洲看来是如何引人注目或甚至令人震惊，也都将在海外得到充分的理解。” 但是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他

在中国的大局中维护了北洋政府对抗孙中山的南方，也与以张嘉璈为首的银行界相对立；当时的英美等列强基本上是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南方，甚至为争税余而派军舰到广州湾，对孙中山政府进行威胁，以致孙中山发表“告美国人民书”表示对美国的失望。何况，在整个对外关系的大局中改变不了税务司长必须是英国人的规定，而且最终人选还得英国人同意。

（三）1946 年以后为蒋介石争取美援 1946 年 6 月底，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内战大规模爆发之时，蒋介石专门起用顾维钧任驻美大使，任务很明确，就是争取美援打内战。论学识、威望、与美

国各界的关系，以及外交才能和经验，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能对美国政府或舆论产生任何影响的话，顾应该是最佳人选了，蒋介石应算是知人善任。顾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也的确尽了最大努力。这是他最后一任大使，在任共十年，从代表整个中国到代表踟居一岛的台湾当局。在美国方面，这一时期对援蒋也并非一贯，内部意见分歧，决策也经过几次动摇。作为大使，顾的任务就是争取美国持续援蒋，防止美国弃蒋。在这种形势下，他在美活动有一定的特殊性，特别要致力于团结坚决反共的右派，影响美国的决策。为此，争取舆论和“院外游说”成为重要的工作内容。

三 外交努力与中国进步潮流相悖（2）

为争取公众舆论，他亲自出马，到美国各地、各团体、大学、俱乐部等发表演说，主动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此类活动之频繁，为大使中所罕见。其宣传要点处处有的放矢：1. 强调中国统一的重要性，并且以美国南北战争为例（这是在内战前期，到后期，则转而要求美国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守住地盘，“统一”就不提了）；2. 中国问题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反苏与反对中共是一致的（这是针对美国把中共与苏联区别对待之论）；3. 中国的民主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这是针对美援以蒋政

府“民主改革”为条件)；4. 美国用中共的口号来判断中国事务是危险的（指对国民党腐败无能的批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增加一项内容，就是反对承认北京政府。

更重要的活动是直接影响美国具体决策。为此，顾可以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对美国政治的运作和内部矛盾了解极深，在各有关方面都有关系不一般的朋友，既是了解内情的耳目，又是借以对决策施加影响的渠道。国防部与国务院的意见分歧、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对华政策的情况、国会秘密听政会上的情况、一个部门中几个领导人的不同态度，等等，都有人向他通风报

信。甚至政府向少数国会议员散发供内部讨论用的有关中国的绝密文件，都有议员事先给他过目以便及时准备应答。有几件事足以说明这些活动的效果（当然国民党在美进行游说活动是多渠道的，绝不止大使一家）：1. 1947年11月，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动通过6000万美元紧急援蒋拨款。在此以前，顾向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提到如国会先提出建议这笔援助，希望国务院不反对。该司长说国会未经政府同意而主动拨款使政府为难，无此先例。实际上顾大使已经对国会的议程成竹在胸，国务院还蒙在鼓里。众议院果然主动提出援蒋提案。经过辩论，最后参众两院拨款委员会将此

数减为 1800 万。而国务院的原意是根本不同意的。

2. 《1948 年援华法》的通过，顾大使更是差不多直接参与其事。在这项法案讨论期间，他的使馆就以此为中心工作。他本人天天亲自守在国会走廊。美国著名的退休大使、政治活动家威廉·蒲立德为国会内外的联络员，及时向他通报会议争论情况。最后通过的文本中有关军援和经援的两段关键的修正案竟是顾起草，由蒲立德交给国会中的“朋友”作为自己的意见提出的。甚至把援华条款附在《援欧法》做一揽子交易这种方式，也是顾建议的。在那几天中，美国报纸披露美国已经给国民党大量援助的

事实，对通过进一步援助不利。顾当天就打电话给一位国会议员，提供不同的说法，供他在议会辩论中用。

3. 7500 万特殊拨款。1949 年秋，杜鲁门政府已经开始“脱身”政策，不打算继续援蒋。此时国会讨论新的《对外军事援助法案》原来不包括中国。顾维钧事先得知此消息后，命令使馆工作人员周末加班，连夜赶出要求援助的详细清单，他本人亲自陪速记员工作到凌晨，终能赶在国会讨论前分送国务院、国防部等单位，同时将副本交给国会“中国帮”议员。接着他紧密关注会议辩论进程，甚至应一名众议员的要求，临时起草一份介绍中国形势的发言稿送给他，

以为他争取援蒋的发言之用(!)。最后，国会经过激烈辩论，又通过7500万拨款，用于“泛指中国的地区”。顾维钧的努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顾维钧在十年驻美大使任上前期所做的一切，其客观效果一言以蔽之，是阻止美国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实际上延长内战。后期则客观上是为巩固分裂的局面服务。在他经手的几件大事中有缔结屈辱性的对日和约，默许“台湾地位未定论”，已如前述。他在过去历次执行外交任务中主要关心的是维护民族国家的权益，基本上超脱于国内政治派别斗争和人事矛盾，并为国内的不团结和种种陈规陋习痛心疾首；而这最后的十

年中，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他为之效命奔走的是江河日下的国民党一边。背离了本文开头阐述的他自己规定的外交官行事原则。如果说有什么依据的话，那就是反共。这个时期正是冷战走向高潮，顾一反他一贯理智、持平的风格，以坚定的反共姿态出现，因而在美国的朋友也多为共和党右派。他甚至对麦卡锡发生好感，在不同场合与他接触过多次，1954年1月，麦卡锡再次当选为参议员之后，顾出席了一次专门为麦举行的冷餐会，并发表了对麦卡锡赞扬备至的讲话，说：“我们的人民是把他的名字和那些主义和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利他主义等等主义联在一起的。”这说明

他以反共事业为己任已经走得多远了。当年他在巴黎和会、李顿代表团、国联会议以及自 1933 年起任驻法大使十年的主要工作：一切都是围绕抗日的需要，尽量阻止法国屈从日本的要求而危害中国的利益；无论失败或成功，都体现了民族大义。而到最后，他为维护失败的蒋政权而在战败国日本面前忍受屈辱，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剧。

每一个个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处百年动荡的中国而涉足政界的知识分子，更难掌握自己的命运，顾维钧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特例。本文非是苛责于前人，毋宁说是感到惋惜。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所经历的半个多世纪也是中国踉踉跄

跚走向世界过程，其间的艰难曲折是不可避免的。总的说来，顾维钧在推动中国与世界接轨方面还是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2000年8月）

此电子书由习之网 www.5sgou.com 搜集于互联网. 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 如要支持作者, 请购买正版